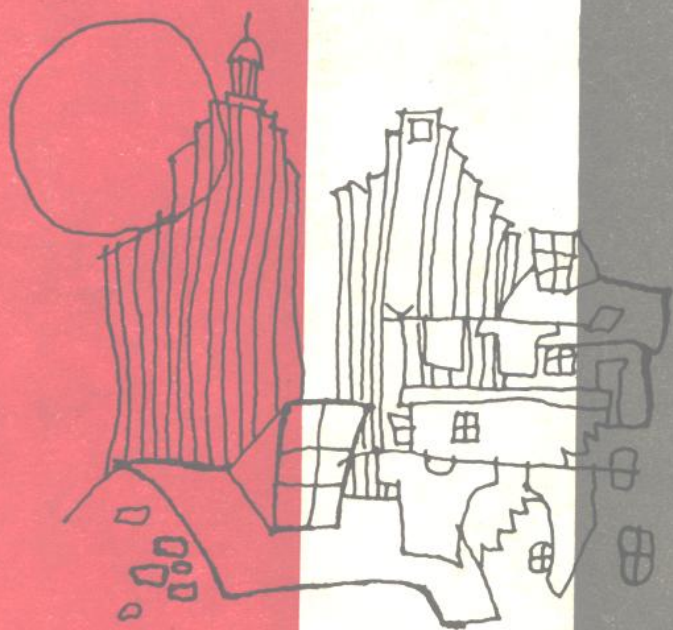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

在上海的“左联”
作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编

上海
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下 卷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重点项目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

(下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 侗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5 字数 781,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5—053—2/I·7

书号: 10299·031 定价: 9.30 元

目 录

(下 卷)

茅 盾.....	孔海珠(1)
胡也频.....	余仁凯(26)
丁 玲.....	王周生(42)
杨邨人.....	陈梦熊(61)
谢冰莹.....	花 建(78)
穆木天.....	张 伟(93)
以 群.....	花 建(104)
任 钧.....	艾 以(118)
胡 风.....	徐霖恩(127)
楼适夷.....	包子衍(147)
于 伶.....	孔海珠(163)
关 露.....	萧 阳(182)
聂绀弩.....	费万龙(196)
李辉英.....	马蹄疾(206)
周 扬.....	张大明(214)
蒲 风.....	潘颂德(230)
天 虚.....	胡从经(246)
艾 芜.....	王尔龄(260)
葛 琴.....	张 伟(274)
周 文.....	陈子善(283)
欧阳山.....	吴锡河(294)
端木蕻良.....	马蹄疾(306)

沙 汀.....	王尔龄(313)
草 明.....	余仁凯(327)
何家槐.....	潘颂德(342)
吴奚如.....	叶中强 梅 平(360)
叶 紫.....	胡从经(375)
彭柏山.....	王向民(393)
东 平.....	胡从经(404)
夏征农.....	吴 慧(422)
徐懋庸.....	王尔龄(435)
周立波.....	王尔龄(455)
丽 尼.....	花 建(469)
舒 群.....	董兴泉(483)
罗 峰.....	董兴泉(493)
白 朗.....	董兴泉(501)
后 记.....	编 者(509)

茅 盾

孔 海 珠

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左联”时期，他同鲁迅一起，为培养左翼文学的新人、壮大左翼文学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一生中，“左联”时期是他文学思想上的成熟期，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期；他以辉煌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

茅盾姓沈名德鸿，字雁冰，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自幼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的熏陶。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先后到湖州、嘉兴、杭州等地求学，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预科，开始接触进步的新思想，三年后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正是在这里，他叩开了文学之门。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十年中间，茅盾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参加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他接办和改革了《小说月报》，使这个月报成为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旧文学的重要阵地；他同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他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在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同时，茅盾用本名和郎损、玄珠、佩韦、明心、希真、冰、玄等笔名写下许多有关文艺、社会政治论文，总数达三百六十余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体现了茅盾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革命的，符合文艺服务于人民革命这一时代要求。正如他说：“我也是混在思想变动这个漩涡里的一分子，起先因找不到一个归宿，可以拿来安慰我心灵，所以也同样感到了很深的烦闷，但近来我已找到了一个路子，把我的终极希望都放在彼上面，所以一切的烦闷都烟消云灭了。这是什么路子呢？就是我确信了一个马克思底社会主义。”^①正因为如此，茅盾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时期，面对着西方各种思想的纷至沓来，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搏斗中，他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中国固有的和外国传来的文化思想加以检验、批判和改造。他撰写的《学生与社会》、《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论无产阶级艺术》、《小说新潮栏宣言》、《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等，都体现出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一时期他所倡导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就是文学“应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一九二六年，在《告有志研究文学者》一文中指出：“文学中所表现的当代人生实在是经过作者个人与社会的意识所拣选淘汰而认为合式的。”因此，他呼吁作家和批评家都要“确定站在一阶级的立点上，为本阶级的利益而立论”。^②并且坚定地指出：“文学决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③

一九二五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同志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秘书。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返回上海。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

① 茅盾：《五四运动与青年底思想》，载1922年5月11日《民国日报·觉悟》。

②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文学周报》第172—196期。

③ 茅盾：《文学者的新使命》，载《文学周报》第190期。

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及“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受党的指示，茅盾离汉经牯岭回到上海。此时，受到通缉的茅盾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他蛰居在景云里不出大门，也不会客，他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之后，他重新拿起了笔。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在这样心情下创作的《蚀》三部曲，“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是难免的，然而，这毕竟是第一部迅速地、真实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和追求，有它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说，“从事件的发生到成书，相隔时间很短，这一事实表明，茅盾的首要目的是在刚刚经历的事件尚未淡漠时将它们记载下来。在现实成为历史之前最准确地、迅速地捕捉住它，这就是茅盾的基本艺术准则。”“其主要动机是要找到一种倾吐充斥于这一代人心中的情感和感受的方式，不然的话，他们会被逼得发疯的。”^①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然而，茅盾是理智的，他是受到现实的冲击之后又善于沉思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艺术地、忠实地反映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众的心理。茅盾初试小说创作写出来的这部作品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创造社、太阳社一些普罗文学提倡者的非议，这使他陷入痛苦之中。

① J·普实克：《中国文学随笔三篇》，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

第2卷第1523页。

一九二八年七月，茅盾东渡日本，客居时仍以笔耕为生，作品虽时有沉闷压抑的情绪流露，但开始注意摆脱干扰。那时，他收到胞弟沈泽民化名罗美在莫斯科辗转给他写的信，专谈他看了《幻灭》后的感想，字里行间透露了欣喜关切之情，并直言指出了作者思想立场上的缺憾。^①茅盾珍视这种意见，感到泽民的批评和期望同样重要，将它在国内发表。在清理思想后，茅盾对革命前途日渐乐观，这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虹》，反映了作者思想情绪的转变。这时国内革命新形势的复兴，给茅盾以鼓舞，他深感在日本“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②为赶快追踪已变化的时代，他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初回到了火热斗争的上海。

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刚一个月，经由冯乃超的联系他很快参加了“左联”。鲁迅表现出欣喜的心情，这在许广平的回忆中有所涉及：“茅盾先生从东洋回来了，添了一支生力军，多么可喜呀！那时，压迫并不稍宽，茅盾先生当即被注意了。先生和他以前在某文学团体里本有友情。这回手携手地做民族解放运动工作，在艰难环境之下，是极可珍视的。”^③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左联”的旗帜下茅盾又以战斗的姿态，参加到以鲁迅为旗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来，成为“左联”时期杰出的革命作家和文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在茅盾的创作道路上，“左联”时期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在创作上的飞跃和突破时期，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优秀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究其思想上和创作上演变的轨道，对我们了解在特定时期的这位伟大作家是有帮

① 罗美(沈泽民)：《关于〈幻灭〉》，载《文学周报》第8卷第10期。

② 茅盾：《我的回顾》，载《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出版。

③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原文“茅盾”两字，系用“××”代替。

助的。如果我们把“左联”分成前期、后期两个阶段，那末“左联”前期是他“演变轨道”的起步，也是他在思想上、创作上产生明显变化的重要阶段。而“后期”则是他“四面出击”时期，他不仅创作了举世公认的杰作《子夜》，为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表率，而且为培养文学新人、为中国左翼文艺走向世界、为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等等贡献了他的心血，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

“左联”前期和后期的时间起讫，按照茅盾的划分，可以依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为界限。这个决议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化了不少心血，执委会研究了多次，是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茅盾称它“标志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①这里所说的“旧阶段”，指它从“左”倾错误路线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那个阶段，而“新阶段”则是指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并开始了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样，就把决议作为“左联”分前期、后期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为“左联”前期；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解散为“左联”后期。^②

二

茅盾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的开头半年的生活，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我在加入‘左联’的头半年，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也没有给当时‘左联’的刊物写文章，只是埋头搞自己的创作，或者什么都不做，十足成了一个‘保持作家的旧社会关系的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② 夏衍认为，“左联”后期时间的起点，应该划分在“一二·九”淞沪战争之后。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05、2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出版。

消极怠工者’和‘作品主义者’。”^①这里有一个客观原因，茅盾在异国两年，虽时有国内形势和文坛消息传递，但毕竟无法确知，他需要时间观察、思考，而且环境也不允许他作过多的活动。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段话的含意是什么？为什么他在加入“左联”之后又“消极怠工”，“头半年”态度和以后又有什么关联？

首先，应看到茅盾非常赞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个主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等）和革命作家（以鲁迅为代表）实行联合，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不是过去“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所以，茅盾并不介意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角色”，他们之间过去有过“笔战”，当冯乃超代表“左联”邀请茅盾加入“左联”时，欣然同意。当然，他这样做是符合他从日本回国的初衷，也是他加入“左联”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态度。但是，茅盾加入“左联”之后，发现“左联”的实际行动与“左联”“纲领”上讲的并不一致，而这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茅盾不赞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左联”要求成员化很多精力去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等政治活动，甚至在讨论迎接纪念“五一”的会议上“左联”负责人提出，今年的“五一”是“血光的五一”，“街头是我们的战场”等口号。为搞这类行动，牺牲了我们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同志，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已是很足惜了，但这又不便公开反对，茅盾对这些活动基本上是不参加的。

2. “左联”象个政党，要求作家参加过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在当时通过的决议里，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如决议中说：“‘左联’的组织原则不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在‘左联’工作发展当中，斗争精神的缺乏，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58页。

青年基础的薄弱，很明显是说明‘左联’的组织依然有作家组织这个狭隘观念的存在”。^①并要求作家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还不顾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讯员”的经验，把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意义极端化，成为“左联”压倒一切的工作，这样，本来是一个文学团体的“左联”，连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受到限制，这是茅盾“消极怠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3. 在当时“左联”的刊物上，大多作品是普罗文学的继续，一种把创作理解为“政治宣传大纲”和“公式主义的结构和脸谱主义的人物”的倾向，是茅盾早就反对的，并以为这个错误倾向不应再继续下去，所以也不给这些刊物写文章。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茅盾只去做自己能做的实事——埋头搞自己的创作。在这半年里，茅盾的创作在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他想描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暴动，于是研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的经济发展，战国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潮流，乃至典章名物等等。对此，他曾作如下的说明：“一是写惯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受尽非议），也想改换一下题材，探索一番新形式；二是正面抨击现实的作品受制太多，也想绕开去试试以古喻今的路。”^②但要写成长篇小说，由于受很多方面的制约而终于作罢，于是“取其大纲改成短篇小说”。自一九三〇年八月起，以每月一篇的速度给《小说月报》（当时由叶圣陶主编）写了三篇。《豹子头林冲》、《石碣》取材于《水浒》；《大泽乡》叙述陈胜、吴广起义的史事。茅盾以为，“总的说来不很成功”。《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的创作，显然不符合“左联”的决议中对盟员的要求，难免被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其实，在文网森严之时试走以古喻今的创作路子，决不是没有意义的，明眼人会看到作者的创作

①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载《文化斗争》第1卷1期，1930年8月15日出版。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59页。

意图和作品流动着的阶级意识和时代特点。这三篇历史小说发表后,就有人评论它“充溢着反抗的意识,同时,在另一面,是还有讽刺的意味”。^①

这半年里,茅盾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也积极把他的意见向“左联”某些领导人提过,希望能纠正极“左”的作法。只是在立三路线盛行时期,大家都无力挽回这个路线性的错误,直到一九三〇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瞿秋白、沈泽民等在这时候相继回国,才使“左联”有了新的转机。这时,茅盾也结束了他的“自由主义”的探求生活。这半年来显示了茅盾在极“左”路线下的独立思考秉性和由丰富的革命阅历锤炼起来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他不随声附和也不怕营营之声,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念。正当他克服悲观情绪并以战斗姿态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来的时候,他提出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答复,但他一如既往对党忠贞不渝,表现了他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

三

瞿秋白、沈泽民等的相继回国,他们不仅向茅盾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且支持他写小说,这对一直过着地下生活,又不愿做“空头革命家”的茅盾,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茅盾和瞿秋白是相知甚深的挚友,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他们都把自己的文学爱好搁置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是共同的政治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左联”时期,他们又相逢在上海。秋白对茅盾的创作十分关心,他是最早认

① 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1931年6月10日出版。

识和评价茅盾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评论家。他的批评准确、中肯，笔锋犀利；他常常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分析问题，既全面又深刻，使茅盾心折。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常和他商讨，并根据他的意见加以修改。

一九三一年，茅盾写了两部有关学校生活的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茅盾说，《路》是“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也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①这里所说的朋友就是瞿秋白。《路》还在写作过程中，秋白看了开头几章，就作了这样的建议为茅盾所接受。这部作品出版后，秋白又看了全书，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茅盾在此书再版时就又删去了三、四页。

《路》是写得较好的一部，至于《三人行》，茅盾说：“这部中篇，从六月写到十一月，化了半年时间，我写小说，凡是写得快的，就比较可观；写得慢的，就不行。《三人行》篇幅不比《路》多，写的时间却比《路》长。”^②又说：“《三人行》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以为是那个正面人物云没有写好。”^③瞿秋白很关心茅盾的创作，当看完这篇小说以后，旋即以易嘉的笔名写了《谈谈〈三人行〉》，对该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首先肯定了作者写《三人行》的立场^④，“这是革命的立场，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立场。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的立场不同了，——然而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接着他具体地分析了作品中所写的三个人物：许、惠、云都失败了。他指出：“‘三人行，必有我

① 茅盾：《路·后记》；载《路》，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6月出版。

②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69页。

④ 载《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出版。

师焉’，而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接着又说：“为什么？因为：一则《三人行》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的，单就三种人物的生长和转变来看，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二则这篇作品甚至于反现实主义的。”文章的结束语说：“如果《三人行》的作者从此能够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那么，《三人行》将要是他的很有益处的失败，并且，这是对于一般革命的作家的教训。”言词是这样尖锐，有些地方不免过当，但茅盾吸取了其中正确的意见，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这一创作失败的教训。直到一九五二年他在《茅盾选集》自序中还诚挚地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沈泽民是茅盾的胞弟，1926年随同刘少奇等去莫斯科，参加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留在莫斯科，先后在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从事政治工作。一九三〇年秋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沈泽民很敬重哥哥的学识，也羡慕他从事文学创作，茅盾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他们曾合作翻译过不少弱小民族国家的小说，而此时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无暇顾及其它，但他不忘情于文学。早在看到乃兄的《幻灭》时，他在遥远的莫斯科给哥哥写信，希望他“择取现在中国民众生活最深处的情绪，来作一部小说。”并鼓励他“赶快追踪目前在群众心理生活中所起的巨大变迁而加以相当的反映，谁能正确地认识它，分析它而指示出它的趋势来的，这是时代的先驱，发聋震聩的惊雷。”并相信他哥哥的创作能力是能够充分表现这个时代的。如今相逢在上海，则更希望茅盾能奉献反映时代的新作来。在这些促进因素下，使茅盾酝酿一部新的大型的作品。

由于许多刊物被禁，“左联”提出了要办一个“内容比以前充实

的机关刊物”，由鲁迅、茅盾、冯雪峰出任编辑，这就是有名的秘密刊物《前哨》。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筹备第一期时，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柔石等左翼作家和革命者事件，消息传来，激起了鲁迅和茅盾的极大愤慨，临时决定把第一期改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血腥罪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史沫特莱和茅盾合作把其中所载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译成英文，鲁迅和史沫特莱一同起草了《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关于后者，史沫特莱在《记鲁迅》一文里曾有一段回忆：“在我离开他（按：指鲁迅）家之前，他和我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向西洋各国的知识分子控诉在中国发生的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屠杀。我把那宣言拿到茅盾那边。他把它修改了一下，然后帮同我把它译成英文。由于这一篇宣言，从国外传来了第一声抗议。五十多个美国的领袖作家，一致抗议对中国作家的屠杀。国民党当局很是吃惊，西洋各国也在非难他们了！”^①同时又有英、德、日等国进步作家与团体发来了抗议诗文。这是他们三位战友第一次合作斗争的大事，也是茅盾回国后第一件干得痛快的事。

同年五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在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同志的密切配合下，共同研究改进“左联”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扩大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努力。大致做了这样几件事：

1. 把“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出了一期被禁），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专门刊登文艺理论研究文章。

^① 史沫特莱：《记鲁迅》，《中国之战歌》中的一章，此据万歌译文，载《北方杂志》第5期，1946年10月出版。

2. “左联”是个文学团体，为了把文学创作提到重要的地位，办了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北斗》，公开发行，由女作家丁玲主编。既刊登“左联”作家的作品，也有刊登非“左联”作家的作品，很受青年欢迎。

3. 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一九二八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茅盾听从了秋白的建议，写了几篇文学论文，这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最早写出的论文。

4. 对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展开批判。史铁儿（瞿秋白）、晏敖（鲁迅）、石萌（茅盾）都写了文章。

5. 共同拟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是“左联”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它是对以前的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此后一段时间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在忙于“左联”的各种行政事务，参加各种秘密会议之外，化了相当精力撰写论文（包括《“五四”运动的检讨》、《关于“创作”》、《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等）。这些论文不仅是茅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而且表达了作者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积极思考和正确引导，希望通过他和同道们的努力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向前推进。

早在二十年代，茅盾的文艺思想从提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后，随着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整个中国出现了空前黑暗，茅盾在苦闷和不满中写了小说《蚀》和论文《从牯岭到东京》、《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读〈倪焕之〉》等，这些作品可以代表他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经过短暂的停顿，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许多革命作家团结在“左联”的旗帜之下，这时候回顾历史、分析现实、沉淀经验教训显得格外重要，茅盾在瞿秋白、鲁迅的督促下写出的文艺论文反映时代的需要和